

顾 农 著
文 选 论 丛
WenXuanLunCong
广 陵 书 社

文选论丛



顾 农 著
文 选 论 丛
WenXuanLunCong
广 陵 书 社

文选论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选论丛 / 顾农著. —扬州:广陵书社, 2007.9
ISBN 978-7-80694-192-8

I. 文… II. 顾… III. 文选—文学研究—文集 IV.
I206.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40874 号

书 名	文选论丛
著 者	顾 农
责任编辑	王志娟
出版发行	广陵书社
	扬州市文昌西路双博馆附二楼 邮编 225012
	http://www.yzglpub.com E-mail: yzglss@163.com
印 刷	扬州市机关彩印中心
	扬州市府西路 8 号 邮编 225009
开 本	787 × 1092 毫米 1/16
印 张	20.75
版 次	2007 年 9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80694-192-8/I·49
定 价	45.00 元

广陵书社版图书如印装错误可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序

如今我竟然将自己前前后后所写的与《文选》有关文章的一大部分汇印为一书，与两位朋友关系很大，一位是我的老同学许逸民先生，一位是主持扬州文化研究的学者型领导赵昌智先生。

多年以来我的学术工作主要有两个场地，一是中古文学研究，一是鲁迅研究——这两者之间关系本来也很密切，鲁迅最重魏晋文章。安排两个作坊的好处是可以交替进行，减少疲劳和麻痹，通过互动而获得灵感。一头栽进某一狭小的领域长期往而不返，就我这样心猿意马的人而言，是容易因疲劳而失去思维的活力甚至产生厌倦的。

萧统《文选》自然一向在我视野之内，放在案头，常常查阅，但倒也没有专门来研究它的意思。到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逸民兄来扬州出差，相见甚欢——我们已经有二十多年没有见过面了，只知道他先在中华书局当编审，后到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领导小组担任什么要职，做了许多卓有成效的工作，总之要算是一位很有地位的文化官员了；不过闲谈之际，他的丰采同六十年代我们同学的时候并无不同，岂但毫无官腔，仍然还是那么坦率热情，风趣盎然。

他问我最近干点儿什么。我说没有干什么，无非是上课、下课、看书、写点文章之类。从来如此，今后大概也不会变化。自我感觉还好。

“你好像还在写鲁迅？”

“写一点儿。搞的时间长了，有些心得，不写下来心有未安。有时要开会研讨，或举行纪念活动，更非得写一点不可。”

“魏晋搞到哪一步了？”

“到哪一步很难说，反正还是正在进行之中。这可是个无底洞。”

其实到处都是无底洞；他建议我搞点《文选》研究，并告诉我这一方面已经在东北开过一次国际性的学术讨论会，日本来了许多人；明年开第二届，要我带篇文章来开会。“你就在扬州，不研究《文选》太可惜——也太不像话了！”

要写的东西太多，不像话的事情不少。我答应他就来动手。关于《文

选》，我本来也颇有些想法，只是一时还没有来得及忙到这一方面。时间不够用啊。

“那当然。我也是时间不够用。开会和睡觉都很耽误时间，毫无办法——不过，你一定要把文选学的论文优先写出来！下次开会一定恭候大驾！”

在一个很破的小茶馆里喝了几杯淡茶，开了个把玩笑，他就匆匆回北京去了。我则动手来安排提纲，检索材料。老许交代的事情，当然是要快办的。不久写成了《风教与翰藻》一文，打算就拿它去参加1992年夏天在长春召开的第二届国际文选学研讨会。

草拟此文之前稍稍检索比较新的文献，于是读到日本立命馆大学清水凯夫教授的宏文《〈文选〉编辑的周围》，他的一个基本观点是论定《文选》的编者并非萧统而是刘孝绰，昭明太子只挂一个空名。这让我大吃一惊，而他的论证方法尤其令人不敢苟同，于是在准备向会议提交之文章的注释中顺便作了一点述评，这本来不过是涉笔成趣捎带提到一下；及至到了长春，才知道清水先生已来赴会，估计有戏。在几天的研讨中不无往返论难，反复切磋，清水先生的坦率和执著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我们因热烈争论而结为朋友，并得以拜领他在中国出版的大著《六朝文学论集》。稍后通读一过，越发觉得他的结论和方法都完全不能接受，他的“新文选学”照我看很难立足，于是作《与清水凯夫先生论〈文选〉编者问题》一文，稍陈己见；其间我曾与他通信多次，于互通信息、交换论文之外，颇得切磋之乐。不久之后，我得到清水先生极其热烈的正式反驳，他那篇长文《答顾农先生并论“新文选学”的课题和方法》，有两种中译本，其全译本收入他在中国出版的《清水凯夫〈诗品〉〈文选〉论文集》一书中。1995年夏在郑州再一次召开国际文选学讨论会，清水先生向会议提交的论文正是这一篇。会上有人对清水“新文选学”给以极高的评价，我是不敢苟同的，但没有时间多讲；如今已成古人的四川师范大学屈守元老先生发表了很好的意见，将所谓“新文选学”批得体无完肤。这次会议前我写了两篇关于《文选》注的文章，其中关于李善注的一篇已先期发表，向这次盛会提交的论文是《关于〈文选〉五臣注》。会上有一组发言是关于五臣注的，大家不约而同地试图修正过去对五臣评价偏低的倾向，主张给予实事求是的估价，经过很热烈的讨论，大体上取得了比较一致的意见。我的兴奋点既在这里，因此未

就清水先生对我的严重责难提出答辩,只是在会后撰写并发表了《评清水凯夫“新文选学”》一文,以答谢他点名回答、殷勤驳难的雅意。

关于“新文选学”以及日本学者关于中古文坛的另外一些意见,我大抵不能赞同,于是在这一阶段撰写的其他文章中,也多多少少有所涉及,但都没有来得及充分展开。我本来颇有意于此作些更详细的讨论和述评,可惜由于不通日文,单靠二手译文来讨论,总觉得不能彻底,便废然而止了。真是要学通日文才好。

《文选》和《文心雕龙》的关系,历来受到人们的重视,但结论似乎都不免偏至,有简单化之嫌。事实上这中间情况比较复杂,我就此提出一种似乎是折中的意见,自以为比较符合实际。《文选》和《诗品》的关系也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我在研究中也曾略略涉及。

分析萧统与刘勰乐府诗观之异同的文章,是同研究生唐春亮君合作写成的;把《文选》、《文心雕龙》和《诗品》加在一起来讨论的那篇《各具特色的默杀》,则是同儿子顾钧合作写成的。我当然很希望有青年人来研究《文选》,可惜他们事情多,工作忙,难以集中精力从事于此;就是我本人,也不能完全埋头于《文选》。此后我对文选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讨论《文选》入选的若干作品,一篇一篇的来——这样的研究,同我的教学关系比较密切,其中有些干脆就是从回答疑问而生发出来的文章。这样的文章,今后还打算再写若干,尽管现在我已经可以不上课了。

本书将通论《文选》的论文算作上卷;分论《文选》中具体作品的算作下卷,文章按所论作品在《文选》中的先后排列,粗看上去有点乱,其实秩序是井然的;又将相关的三篇文章列为附录。《兰亭集序》何以未入《文选》,古今有许多纷争辩论,而该序的真伪一度也成为严重的问题,这里略抒己见。另外两篇则是文选学的花絮,放在最后作为余兴。

《庄子》一书分内、外、杂三部分,本书的结构略近此意,只是不便高攀,于是形成现在这样的格局。

能将散乱的旧作编辑起来印成一本书,完全出于赵昌智先生令人动容的关心和促进。我同他原先本不相识,只是非常钦佩他的人品和学养。近年来因为常在一起讨论扬州文化诸问题,来往稍多,赵先生关心扬州文化研究的各个领域,统筹全局,带队冲锋,卓著勋劳;他多次督促我大搞文选学,又力促本书的出版,高情厚意,铭感之至。广陵书社为了弘扬传统文

化出了许多好书,我能够在这里出一本专题论集,深感荣幸。责编王志娟女士做了非常细致的工作,她的敬业精神真值得学习。

扬州人应该好好研究《文选》,这里本是文选学的故乡。数年前我写过一篇《文选学在扬州》,又写过介绍文选学奠基人曹宪、李善的短文,这两位都是我们扬州人,为纪念他们而建的文选楼至今尚存;清代推动文选学研究的大师阮元也是扬州人,他的故居和坟墓现在也还在;近现代研究文选学的重镇李详和朱自清还是扬州人。身为扬州后学,实在有责任继往开来,接着做一点事情。否则,于心亦有所不安也。

顾农 2006年立冬 于瘦西湖畔听箫楼西窗下

本书付印前夕,钱宁罗、童李君、孔祥军三位青年朋友帮我校字,颇有订正;孔祥军博士指正尤多,我还根据他的学位论文增补了一条注释,在《曹植〈朔风诗〉解读》一文中。老话说“一道篱笆三个桩”,此亦放之四海而皆准、历尽古今而不变之论也,多经风雨的篱笆尤其是如此。

顾农附记于2007年7月

目 录

序

上卷

《文选》的三重背景 /1

风教与翰藻——萧统的文学趣味及《文选》的选文趋向 /9

与清水凯夫先生论《文选》编者问题 /18

评清水凯夫“新文选学” /26

刘孝绰“名教”案与《文选》的编撰 /34

李善与文选学 /39

关于《文选》五臣注 /48

文选学新研二题 /58

试论《昭明文选》与《文心雕龙》的关系 /66

刘勰与萧统乐府诗观之异同 /78

萧统《文选》与钟嵘《诗品》 /85

各具特色的默杀——刘勰、钟嵘、萧统文学史观之一瞥 /92

下卷

左思《三都赋》及其序注综考 /98

祢衡论——以《鹦鹉赋》为中心 /111

《闲居赋》与潘岳其人 /120

林下之游的终结与向秀《思旧赋》 /124

中古时代的四篇《寡妇赋》 /128

《文赋》与《演连珠》 /132

《洛神赋》新探 /138

平庸的文人应贞 /146

临别之际大谈玄理——读孙楚《征西官属送于陟阳侯作》 /148

石崇、潘岳与金谷集诗 /151

谢灵运诗《邻里相送至方山》解读 /157

说“左思风力”及其背景 /161

- 论郭璞《游仙诗》的自叙性 /170
- 江淹与建平王刘景素 /178
- 读阮籍《咏怀诗》札记二则 /184
- 关于曹植《七哀》及其晋乐所奏本
——并向桀溺(J-P.Dieny)先生请教 /191
- 嵇康《幽愤诗》解读 /197
- 谢灵运诗《庐陵王墓下作》解读 /204
- 关于刘琨与卢谌的赠答诗 /208
- 陆机、陆云与吴王晏 /219
- 略谈曹操的《短歌行》 /224
- 建安时代英雄主义的赞歌——略谈曹植《白马篇》 /227
- 陶渊明对陆机的模仿与超越 /230
- 有节制有节奏的感情喷发——刘琨《扶风歌》赏析 /234
- 读古诗札记二则 /239
- 从《四愁诗》到《我的失恋》 /244
- 曹植《朔风诗》解读 /250
- “江东步兵”张季鹰 /254
- 陶渊明:在家常生活中安顿精神家园 /257
- 陶渊明与菊花酒 /265
- 《离骚》中的角色转换 /268
- 试谈《离骚》的总体结构 /275
- 《涉江》阐释 /284
- 《出师表》的潜台词 /287
- 《陈情表》答问二题 /291
- 《为郑冲劝晋王笺》作年考 /294
- 《与山巨源绝交书》作年考 /298
- 丘迟和他的《与陈伯之书》 /300
- 陶渊明的“僮仆” /304
- 《毛诗大序》的合理内核 /307

附录

- 《兰亭集序》真伪问题的再思考 /312
- 读《选诗句图》 /323
- 访扬州文选楼 /325

上卷

《文选》的三重背景

萧统(501~531)《文选》的出现是中古文学史上的一件大事,其背景材料大体可以分为三个层次来叙述。

作家作品的日益增多必然呼唤具有选集性质的总集的出现。最早的文学总集是西晋挚虞编撰的《文章流别集》,《隋书·经籍志》说:“总集者,以建安以后,辞赋转繁,众家之集,日以滋广。晋代挚虞苦览者之劳倦,于是采摘孔翠,芟剪繁芜,自诗赋以下,各为条贯,合而编之,谓之《流别》。是后文集总钞,作者继轨,属辞之士,以为覃奥,而取则焉。”作品日繁,览者劳倦,于是选集应运而生,这个分析是合乎情理的。

建安以来文学作品急剧增多的势头到晋、宋以后变本加厉,至齐、梁达到高潮。据统计,从东晋初年到萧梁天监四年(505)不到两百年时间,皇家藏书增加了76倍,其中从刘宋之末的元徽到天监的三十二年中,每十年增加2500卷,是增势最猛的时期¹。图书典籍的增加当然包括各方面的著作,但其中占相当大比例的乃是文学作品。南朝特别是齐、梁时代,作家辈出,文风极盛,从事诗赋创作在社会上成为一大热门,正如钟嵘曾经说过的那样,“今之士俗,斯风炽矣。才能胜衣,甫就小学,必甘心而驰骛焉”(《诗品·序》)。面对急剧增多的文学作品,“苦览者之劳倦”的问题较之挚虞的时代严重得多了,编辑新的选本已经刻不容缓。

挚虞当过秘书监,有条件利用西晋皇家藏书,因此能够成为开风气之先的选家。萧统的条件就更好一些。东晋、南朝统治者对图书古籍的整理表现了很高的热情:东晋曾两次编制皇家藏书总目录;刘宋也是两次,分别由谢灵运、王俭主持其事,王俭还另编过《七志》,多录今书,且有叙录,水平尤高;齐代于永明元年(483)编过《秘阁四部目录》;梁代在天监四年(505)和六年(507)先后编制了《文德殿正御四部及术数书目录》和《四部书目录》,阮孝绪在天监四年五部书目录的基础上博采民间藏书,用毕生精力编撰了著名的《七录》,其中“文集录”著录图书1024种、10755卷。皇太子萧统有足够的条件充分利用皇家所藏典籍,他本人藏书近三万卷,东宫有专门的四部目录,他手下文士甚多,因此又可以借此利用民间藏书。萧统的工作条件比挚虞好得多了。文学以至整个文化事业的空前繁荣是《文选》得以问世的前提和条件。

¹ 详见王重民《中国目录学史论丛》,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49页。

促成《文选》问世的另一重背景,是自从建安以来文学界对于文体分类的研究越来越予以重视;而关于如何分类、各类文体的规范如何等问题,大抵要从前代以至当代名家名作出发来进行探讨。中国文化传统的一个重要侧面是讲规矩讲程式,离规矩不足以成方圆,无程式人们便无所遵循,既然各种文体有不同的功用和特点,因此执笔之际就要遵守一定的规范,采用适当的风格;批评一篇文章,往往首先要检查它是否合于一定的规范。一般的作者才性不能无偏至,因此不可能兼善众体,所以批评家每致力于分析其优劣得失,指导作者向着才性所宜的方向发展。在中国古代,文体论不仅是一种分类研究,而且与创作论、批评论关系都很大,是文艺学研究中历久不衰的一大热门。

关于文体分类问题,曹丕在《典论·论文》中首先提出所谓四科八目,讲得比较概括;到陆机《文赋》便分作十种,原先排在最后的诗赋被提到前列,各体的规范也讲得比较细致。到挚虞,更联系所选之文来畅论文体问题,并且十分注意在历史的变迁中研究文体的初原状态、古今之变以及假借名义似是而非等各种情形。现在可以见到的《文章流别论》之遗文都是讲各文体应具之规范的,试看一例:

诗颂箴铭之篇,皆有往古成文可放(仿)依而作,唯诔无定制,故作者多异焉。见于典籍者,《左传》有鲁哀公为孔子诔。

哀辞者,诔之流也。崔瑗、苏顺、马融等为之。率以施之童殇夭折不以寿终者。建安中,文帝与临淄侯各失稚子,命徐幹、刘桢等为之哀辞。哀辞之体,以哀痛为主,缘以叹息之辞。

既注意追溯起源,又重视近人的名作,态度较为公允。稍后于挚虞的李充在《翰林论》中也十分注意文体问题,遗文涉及赞、表、驳、论、奏、盟、檄、讨等,议论比较简明,注意标举名篇。此后更深入细致地讨论文体问题的是刘勰,《文心雕龙》一书用五分之二的篇幅对三十多种文体进行四个层次的分析研究:“原始以表末,释名以彰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序志》),将曹、陆、挚、李以来的有关研讨推向空前完备而深入的阶段¹;其中“选文以定篇”的部分对萧统编撰《文选》显然不无启发。

在文体分类问题上《文选》充分吸收了前人的成果,也有新的发展;它将“文”分为三十八个体类,尽管这一分法颇遭后人批评,但在当时是有它充分的根据的。三十八这个数目与刘向、刘歆父子总校群书时将各种典籍分为三十八类恰好相符,尽管他们所处理的对象并不相同——三十八这个数目在目录分类上有着一种传统的魅力。

¹ 参见拙作《〈文心雕龙〉中的文学风格问题》,《扬州师院学报》1991年第2期。

鲁迅先生说过,编辑文章有两种办法,或分类或编年,“分类有益于揣摩文章,编年有利于明白时事”¹。萧统《文选》继承挚虞《文章流别》、李充《翰林》的传统,按文体分类选文。《文选序》的前半扼要地论述各种文体的古今变化,然后写道:“余监抚余闲,居多暇日,历观文囿,泛览辞林,未尝不心游目想,移晷忘倦。自姬汉以来,眇焉悠邈,时更七代,数逾千祀,词人才子,则名溢于缥囊,飞文染翰,则卷盈乎绡帙。自非略其芜秽,集其清英,盖欲兼工,泰半难矣。”其按体类选文,为读者提供精品范本之意,已极昭然。这是建安以来几代批评家想做已做而未能完全做好的事情,萧统率领其手下的文士们做得很出色,这一份历史功绩是值得大书特书的。

上述两重背景都是比较明显的事实,更重要的背景还在于萧梁时代思想活跃,文坛上流派纷呈,彼此较量,各派除了直接发表议论以至交锋之外,通过清理传世作品的方式深切著明地宣传自己的观点,指引文学发展的方向,也是理论家乐于从事的一件工作。

关于文学选本,鲁迅先生发表过一个著名的意见,他说:“选本所以借古人的文章,寓自己的意见”;“凡是对于文术,自有主张的作家,他所赖以发表和流布自己的主张的手段,倒不在于作文心、文则、诗品、诗话,而在出选本。”²萧统也正是要通过《文选》来宣传自己的主张,反对或修正与他不同的意见。要真正看清萧统的心事,不能不对当时的文坛作一番通盘的观察。

粗一点说,萧梁中期文坛上有三派,一是以裴子野为代表的复古派,一是以萧纲为首的新变派,而作为主流的则是萧衍、萧统领导的折中派。萧统死后,新变派占了上风。

梁武帝萧衍本人是位作家,《梁书·武帝纪》称他“天情睿敏,下笔成章,千赋百诗,直疏便就,皆文质彬彬,超迈今古”。虽不免多溢美之辞,但并非全是吹捧。萧衍对文艺问题非常重视,不仅本人从事创作,而且一贯重用著名作家,对于新人也注意奖掖提拔;当然他也有“护前”(死要面子)的毛病,不允许别人在他面前显示出超越他本人的才华。

萧衍在齐末本是“竟陵八友”之一,“竟陵王(萧)子良开西邸,招文学,高祖(萧衍)与沈约、谢朓、王融、萧琛、范云、任昉、陆倕等并游焉,号曰‘八友’”(《梁书·武帝纪》),其中的沈、谢、王等正是所谓“永明体”的领袖人物,他们讲究四声八病和辞藻的华丽,卷起了一股新体诗的浪潮。萧衍在“八友”中不算活跃,他的宏图大志在于政治方面,文学并不是他关注的重点,但他写诗也追求丽靡,与其余诸友有共同语言,只是他对声韵没有研究的兴趣,遂自立于永明体之外。

萧衍在夺取中央政权、改朝换代的事业中得到了“八友”诸人的支持,

1 详见《且介亭杂文·序言》,《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页。

2 《集外集·选本》,《鲁迅全集》第7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36页。

得力于沈约、范云者尤多,所以他在当了皇帝以后很重用他们。范云死于天监三年(504),沈约比较长寿,于是成了梁初的文章班头。《梁书·文学传序》云:“高祖聪明文思,光宅区宇,旁求儒雅,诏采异人,文章之盛,焕乎俱集。每以御幸,辄命群臣赋诗,其文善者,赐以金帛。诣阙庭而献赋颂者,或引见焉。其在位者,则沈约、江淹、任昉,并以文采,妙绝当时。至若彭城到沆、吴兴丘迟、东海王僧儒、吴郡张率等,或入直文德,通宴寿光,皆后来之选也。”梁初大抵盛行永明体,那时活跃着两代作家:老一代的沈约、任昉是“八友”中人;江淹资格更老,也是萧衍的旧友,曾经全力支持萧衍建立新政权,但在文学上他早已“江郎才尽”,不大写什么了,不久死于天监四年(505);任昉死于天监六年(507),唯有沈约如鲁殿灵光,岿然独存,但已渐渐受到萧衍的猜忌,稍后死于天监十二年(513)。到、丘、王、张是比较年轻的一代,但丘迟长期追随萧衍的弟弟临川王萧宏,到溉“性又不好交游”(《梁书》本传),中枢方面人才并不算很多。萧衍站稳脚跟以后,为了巩固政权,大力提倡儒家思想,在文学方面重用裴子野,在思想文化界掀起一股复古的浪潮。

裴子野主要是一位历史学家,也很能写文章。他从齐末以来就很反对趋于琐细丽靡的诗风,其文学主张见于所著《宋略》中的一节《雕虫论》¹,该文之后半云:

宋初迄于元嘉,多为经史,大明之代,实好斯文,高才逸韵,颇谢前哲。波流相尚,滋有笃焉。自是闾阎少年,贵游总角,罔不揜落六艺,吟咏情性。学者以博依为急务,谓章句为专鲁,淫文破典,斐尔为功。无被于管弦,非止乎礼义,深心主卉木,远致极风云。其兴浮,其志弱。巧而不要,隐而不深。讨其宗途,亦有宋之遗风也。若季子聆音,则非兴国,鲤也趋庭,必有不敬。荀卿有言,“乱代之征,文章匿而采”,斯岂近之乎!

对刘宋以来的诗坛歪风提出极其严肃的批评,钱锺书先生评为“甚切六朝以深博掩浅陋,表华而里朽之弊”²。裴子野的这个基本观点与刘勰、钟嵘等批评家稍后所发表的意见方向基本一致,《文心雕龙》明确指出近代以来文风不正,“去圣久远,文体解散,辞人爱奇,言贵浮诡,饰羽尚画,文绣鞶帨,离本弥甚,将遂讹滥”(《序志》),又说刘宋一朝“自明帝以下,文理替矣”(《时序》),看法与裴子野几乎完全相同。《诗品·序》讽刺那时的“膏腴子弟”,说他们“终朝点缀,分夜呻吟,独观谓为警策,众睹终沦平钝。次有轻薄之徒,笑曹、刘为古拙,谓鲍照羲皇上人,谢朓古今独步……徒自弃于高明,无涉于文流矣”。当时有一批青年舍弃传统,只以文采的华丽为

1 详见[日本]林田慎之助《裴子野〈雕虫论〉考证》,《古代文艺理论丛刊》第6辑。

2 《管锥编》第4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440页。

能事,很少顾及文学的社会效果,对此裴、刘、钟三位都大不以为然。裴子野的《宋略》包括其中的《雕虫论》本作于齐末,到梁代又加以修订,重新问世¹,其中对历史上不良文风的批评,言外自有针对现实之意。

萧衍起用裴子野大约在天监七年(508)之后不久²,这时正是永明体诸老相继凋谢、萧衍进一步大力尊崇儒术之时。前此天监四年(505)萧衍已下诏置五经博士,广开馆宇,招纳后进,以明山宾、陆瑀、沈峻、严植之、贺场补博士,各主一馆,又派遣学生入云门山受业于一代儒宗何胤。天监九年(510)萧衍亲临国子监讲肆,并下诏令皇太子萧统及王侯之子年在从师者都入国子监学习儒家经典。“世习儒史”的裴子野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得到重用的。

裴子野“为文典而速,不尚丽靡之词,其制作多法古,与今文体异,当时或有诋诃者,及其末皆翕然重之”(《梁书》本传)。所谓“典”就是十分重视继承儒家传统的意思。儒家一向主张“辞达而已矣”(《论语·卫灵公》),又极重视文艺的政治、伦理效果。萧衍重用此人看来正是为了配合他的崇儒政策,巩固其政权。萧衍对裴子野评价很高,《梁书·裴子野传》云:“普通七年,王师北伐,敕子野为喻魏文,受诏立成。高祖以其事体大,召尚书仆射徐勉、太子詹事周舍、鸿胪卿刘之遴、中书侍郎牛异,集寿光殿以观之,时并叹服。高祖目子野而言曰:‘其形虽弱,其文甚壮。’俄又敕为书喻魏相元义,其夜受旨,子野谓可待旦方奏,未之为也,及五鼓,敕催令开斋速上。子野徐起操笔,味爽便就。既奏,高祖深嘉焉。自是凡诸符檄,皆令草创。”当时有大批文士,包括萧统手下的文人,与子野“深相赏好”,崇儒复古之风勃然兴起。

裴子野的大弱点在于他对文学的教化作用过分强调,而对审美功能则相当忽视,《雕虫论》写道:“古者四始六艺,总而为诗,既形四方之风,且彰君子之志,劝美惩恶,王化本焉。后之作者,思存枝叶,繁华蕴藻,用以自通。若悱惻芬芳,楚骚为之祖,靡漫容与,相如扣其音。由是随声逐影之徒,弃指归而无执。赋诗歌颂,百帙五车,蔡邕等之俳優,扬雄悔为童子。圣人作,雅郑难分。其五言为家,则苏、李自出,曹、刘伟其风力,潘、陆固其枝叶。爰及江左,称彼颜、谢,箴绣鞶帨,无取庙堂。”他过分重视文艺“劝美惩恶”的社会功能,完全视文艺为工具,眼光是相当狭隘的。在中国古代,凡是史家出来论文,几乎无不片面地重视文艺的社会功能、功利目的。史家由于自己所从事的专业,总是会把文艺的状况同古今的兴衰成败直接地联系起来考虑,而立论每易偏至。裴子野也不免如此。

与裴子野相映成趣的是由萧纲手下的“高斋学士”³以及后来的文德省学士为骨干构成的文人集团,他们抛弃风雅,醉心丽靡,将“永明体”沿

1 《建康实录》卷十四引《宋略·总论》后有“裴子野曰:余齐末无事,聊撰此书,近史易行,颇见传写。此更寻读,繁秽尤多,微重删削,尚未详定。”这一小段话自当写于梁代,惜其具体年代已不可考。

2 《梁书》本传载范缜由中书迁国子博士时曾经推荐裴子野任博士,此事在裴子野四十岁时即天监七年(508);事虽未果,却很能见出一时的形势。此后子野因吏部尚书徐勉的推荐,出任著作郎,掌国史及起居注,而本传称“子野在禁省十余年”,可见他为著作郎应在天监七年之后不久。

3 《南史·庾肩吾传》:“(肩吾)在雍州,被命与刘孝威、江伯操、孔敬通、申子悦、徐防、徐擢、王团、孔铄、鲍至等十人抄撰众集,丰其果饌,号高斋学士。”萧纲一派也在搞自己的总集,此事颇可注意。

着这个方向向前推进。《梁书·庾肩吾传》说：“初，太宗（萧纲）在藩，雅好文章士，时肩吾与东海徐摛、吴郡陆杲、彭城刘遵、刘孝仪、仪弟孝威，同被赏接。及居东宫，又开文德省，置学士，肩吾子信、摛子陵、吴郡张长公、北地傅弘、东海鲍至等充其选。齐永明中，文士王融、谢朓、沈约文章始用四声，以为新变，至是转拘声韵，弥尚丽靡，复逾于往时。”这就是所谓“宫体”。为了推行自己的主张，萧纲坚决反对裴子野的复古主义，反对用儒家传统束缚文学的发展，他尖锐地批评说：“时有效谢康乐、裴鸿胪文者，亦颇有感焉。何者？……裴氏乃良史之才，了无篇什之美。”这段话出于著名的文学书简《与湘东王书》，原载《梁书·庾肩吾传》。据该传可知这封信作于中大通三年（531），这一年在梁代的文学史上是很重要的一年，萧统死于本年三月（稍后萧纲被立为太子），儒学大师何胤也死于这一年，而其上一年裴子野已先行离开了人世。于是萧纲很自然地成了思想文学界的领袖，先前追随他的一批文士地位明显上升，他们在萧纲领导下轰轰烈烈大张旗鼓地推行他们的文学新变运动——“宫体”诗运动。他们原先没有大声疾呼的话都说出来了。

裴子野与萧纲两派虽然各有其合理的内核，但可以说都走向了极端，他们的主张不利于文学的健康发展。

萧统的文学观点比较折中公允，对于永明体、复古派、新变派的合理内核都能有所吸收，对上述各派的弱点则能有所规避，气象阔大，不同凡响。

萧统早年接受过良好的儒家文化教育，“五岁遍读五经，悉能讽诵”（《梁书》本传）。为了帮助他尽快成长，萧衍曾先后派许多学士充当他的师友，有所谓十学士，他们是：王锡、张缵、陆倕、张率、谢举、王规、王筠、刘孝绰、到洽、张缙¹，此外尚有沈约、徐勉、到溉、明山宾、殷钧、殷芸、陆襄、刘孝维、刘孝陵、王训、周舍、刘怀珍、何思澄、刘杳、刘勰、王承、萧子范、萧子显、萧子云、刘苞、庾於陵、庾仲容、何胤、陆杲、王泰、萧孝俨等等，也都为萧统所交接。从这些师友那里萧统得到多方面的营养。这些人当中有前永明体的老将，如沈约；有任昉“兰台聚”²文人圈中诸有为青年；有与裴子野相当接近的人物，如殷芸、张缵，也有新变派的人物，如陆杲，更有杰出的文艺理论家刘勰。刘勰在天监十年（511）前后为南康郡王萧绩记室，兼任东宫通事舍人，历时颇长，史称“昭明太子好文学，深爱接之”（《梁书·刘勰传》），年轻的萧统一定从他那里学到不少东西，得到许多启发。萧统同刘勰一样，既高度重视文学作品的教化作用，也十分讲究艺术表现，圆通广大，不陷于偏颇。在当日的文坛上，他们都属于折中派。

由于死亡、人事调动等原因，在萧统身边的文人不断发生变化，从萧

1 见《南史·王锡传》。参见屈守元《“昭明太子十学士”说》，《俞平伯先生从事文学活动六十五周年纪念文集》，巴蜀书社1992年版，第167～180页。

2 《南史·到溉传》：“梁天监初，（任）昉出守义兴，要（到）溉、（到）洽之郡，为山泽之游。昉还为御史中丞，后进皆宗之。时有彭城刘孝绰、刘苞、刘孺，吴郡陆倕、张率，陈郡殷芸，沛国刘显及溉、洽，车轨日至，号曰‘兰台聚’。”《姓解》以到溉、到洽、张缵、张率、张缙、刘孝绰、刘苞、刘显、刘孺、陆倕为“兰台十学士”。

统成年以后积极从事文学活动之时的情况看,他手下的首席文人当推刘孝绰。《梁书·刘孝绰传》说:“时昭明太子好士爱文,孝绰与陈郡殷芸、吴郡陆倕、琅邪王筠、彭城到洽等同见宾礼。太子起乐贤堂,乃使画工先图孝绰焉。”萧统又特别让他为自己编定文集;萧统主持编纂《诗苑英华》时,大约许多具体工作都是让刘孝绰做的,以致《颜氏家训·文章篇》干脆直接将该书系于刘孝绰的名下¹。在《文选》的编撰过程中,刘孝绰大约也做过不少工作,所以弘法大师(遍照金刚)在《文镜秘府论》中有“梁昭明太子萧统与刘孝绰等撰集《文选》”的提法。近年来日本更有学者认为《文选》完全是刘孝绰编撰的,萧统不过挂一个空名而已。综合各种材料来看,《文选》的主编仍当是萧统,但他不是凭一人之力完成,必有手下的文人参与,在这些参与者中刘孝绰最为重要。

萧统手下的第二号文人当推王筠,《梁书·王筠传》说:“昭明太子爱文学士,常与筠及刘孝绰、陆倕、到洽、殷芸等游宴玄圃,太子独执筠袖抚孝绰肩云:‘所谓“左把浮丘袖,右拍洪崖肩”。’其见重如此。”

刘、王二人是梁代中期创作成就比较高的作家,他们的文学态度正如萧衍和萧统那样带有折中的倾向。刘孝绰是齐代掌制造的名臣刘绘之子,又是“竟陵八友”中王融的外甥,幼有神童之目,王融给予很高评价,以为仅次于自己,“父党沈约、任昉、范云等闻其名,并命驾先造焉,昉尤相赏好”——他是在永明体诸先达的关怀下成长起来的;孝绰于吟咏性情之外亦复“肆意坟典”(《梁书》本传),主张文学应当典而且丽,在思想上与萧衍、萧统所倡导的主潮完全一致。王筠“幼年读五经,皆七八十遍”(《梁书》本传),文风比较典雅。由这两个人的情形也可以推测萧统的文学思想。

总之,在梁代前中期的文坛上,萧衍的文艺政策——既强调必须坚守儒家思想,又不废对于“丽靡”的追求——是一个富于弹性的政策,永明遗风、复古派、新变派,都得以生存和发展;太子萧统及其身边的文人同时追求“典”和“丽”,在强调新的审美趣味时仍能顾及传统的折中态度,最合于父皇萧衍的路线,因此得到长足的发展。这一派文艺主张最集中的表现,便是萧统以“风教”与“翰藻”为两大基本标准的大型文学选本《文选》,他们欲以此为范本,去指导创作,并反对各式各样的偏颇。

萧纲当太子以前主持编选的那部“总集”未见问世,从后来出现的《玉台新咏》一书也许可以见其仿佛。前后两位太子各以其选本来发表和流布自己的文学主张,这是很有意思的事情。半个世纪以前,缪钺先生作《〈文选〉与〈玉台新咏〉》一文²,已揭示此义,可惜文选学界对此尚未予以足够的注意。

萧统死后,萧纲主持文坛,风气为之一变。从梁代后期至于陈,是“宫

1 颜之推称之为《诗苑》,应即为《诗苑英华》的简称,不可能是另外一部书。《隋书·经籍志》载“《古今诗苑英华》十九卷,昭明太子撰。”是《古今诗苑英华》乃全称,《诗苑英华》已经是简称,而《诗苑》则为进一步简化者。

2 载《诗词散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20~23页。

体”的全盛时代,其流愈弊,终于成了唐代文学革新运动攻击的目标。杜甫诗云“窃攀屈宋宜方驾,恐与齐梁作后尘”(《戏为六绝句》),这里的“齐梁”只是衰靡文风的代名词,如果不是顾及音节之美,不如写作“梁陈”为佳。杜甫曾经教育他的儿子要熟读《文选》,认真体会,然则他所指斥的梁,乃是昭明太子萧统身后之梁,亦即萧纲“宫体”时代之梁,研究《文选》的人于此不可不加以区别。